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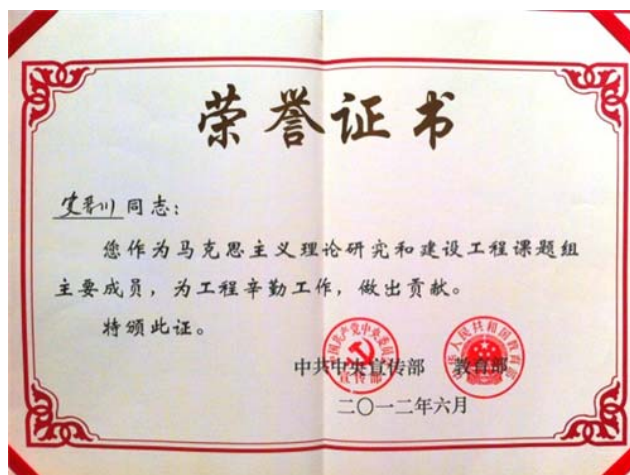
# 中心大事记

2011.7-2012.10

## 🌸 史晋川教授获中宣部、教育部颁发荣誉证书

2012 年 9 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为表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辛勤工作, 做出贡献的理论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史晋川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的主要成员, 获得了中宣部和教育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史晋川教授于 2005 年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并于 2006 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课题组主要成员, 参与《政治经济学》课题的研究及国家统编教材的研究工作。



## 获奖情况

1、茹玉骢、金祥荣、张利风，“合约实施效率、外资产业特征及其区位选择”（论文），浙江省社科联第四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研究类三等奖，2012 年 7 月 18 日，颁奖单位浙江省社科联。

# 科研活动

## 科研项目立项

1、潘士远，“专利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教育部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2.9- 2014.9。

2、汪炜，“萧山市‘十二五’金融创新发展研究”，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2.6-2013.6。

3、宋华盛，“企业海外并购整合风险研究”，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2.9-2013.7。

# 学术成果

## 凡 著作

- 1、朱希伟, 《理性的空间: 集聚、分割与协调》,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8 月出版。

## 凡 论文

- 1、宋华盛、Jacques-Francois Thisse、朱希伟, “Urbanization and/or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42, Jan., 2012。
- 2、林苍祥, “Search Costs and Investor Trading Activity”,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 MAY-JUNE 2012。

- 3、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经济研究》，2012 年 9 月。
- 4、叶航，“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义”，《经济研究》，2012 年第 8 期。
- 5、赵伟、韩媛媛、赵金亮，“融资约束、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机理与实证”，《当代经济科学》，2012 年第 6 期。
- 6、周黎明、史晋川、王争，“融资成本、融资替代与中国典当业的盈利波动——经验证据及理论解释”，《金融研究》，2012 年第 3 期。
- 7、金祥荣、谭立力，“环境政策差异与区域产业转移——一个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
- 8、郎金焕、史晋川，“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与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浙江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0 期。
- 9、史晋川、郎金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0 期。
- 10、许月丽、战明华、史晋川，“双重二元转型与结构调整：模型、命题与中国的经验结果”，《财经研究》，2012 年第 9 期。
- 11、金祥荣、刘振兴、于蔚，“企业出口之动态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2001—2007”，《经济学》(季刊)，2012 年第 3 期。
- 12、汪炜，“浙江破解‘两难困局’的历史性契机”，《浙江经济》，2012 年第 9 期。
- 13、赵伟，“青黄不接的企业领袖时代”，《IT 时代周刊》，2012 年第 Z2 期。
- 14、赵伟，“强化实体经济的发展误区”，《大经贸》，2012 年第 6 期。
- 15、赵伟，“建一个城市‘痛苦指数’如何”，《大经贸》，2012 年第 7 期。
- 16、赵伟，“警惕软着陆说误导”，《大经贸》，2012 年第 8 期。
- 17、赵伟，“外贸政策调整须克服制度刚性”，《大经贸》，2012 年第 Z1 期。
- 18、赵伟，“中国经济：为增长扫清障碍”，《中外管理》，2012 年第 8 期。
- 19、赵伟，“巴西之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浙江经济》，2012 年第 8 期。
- 20、赵伟，“两个悖论现象的寓意”，《浙江经济》，2012 年第 9 期。
- 21、赵伟，“无衰退的产业升级”，《浙江经济》，2012 年第 10 期。

# 学术交流

## 学术会议

### 🌸 2012 年“恒逸学术论坛”（夏季）成功举办

2012 年 7 月 12 日，由浙江大学恒逸基金管理委员会、杭州市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发展局主办，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浙江大学“恒逸学术论坛(夏季)”在萧山区商会大厦四楼会议室如期举行，参加此次论坛的有萧山区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恒逸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及相关社会人士等共 100 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由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楼海祥会长主持。

本次论坛邀请了深圳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家发改委顾问国世平教授为本次论坛做《中国经济深度透视及当前投资分析》的主题讲座。国教授就中国经济的国内环境制约、中国需要颠覆的观念、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

断、对中国目前经济政策的研判、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当前的投资选择、企业如何融资等问题，以生动的案例、详实的资料作深入浅出的演讲。会后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国教授的讲座不仅能提高我们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认识，更对企业规避风险、正确投资提供重要参考和启发。同时通过专家讲授指导和企业家之间地互相交流，进一步开阔企业家的知识面，为企业的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参考。



## 学术访问与学术讲座

### 浙江大学恒逸讲座教授林苍祥先生来访

2012 年 7 月 12 日，浙江大学恒逸讲座教授、台湾淡江大学两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台湾财务工程学会理事长林苍祥先生来访，并于当日下午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为 CRPE 举办的“重庆市渝中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企业管理与创新专题研修班”的学员们带来了一场题为“分析点心债券（计价债券）与台湾债券多元化融资经验”的精彩专题讲座。

此次讲座，林苍祥教授就境外人民币债券的类型的过程进行了深入解析，同时重点介绍了其中的点心债券（人民币计价债券）在香港的审批流程和发行情况，让在座的学员们了解了更多的融资渠道。同时林教授以多年研究台湾债券投融资的经验，为学员们分享了台湾当前企业投融资多元化发展状况，并为企业家们在投融资环境中应采取的策略给予了指导，帮助学员们拓宽了视野，开拓了思路，学习到了宝贵的投融资经验。

整个讲座中，林教授的演讲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不仅信息量大，还具有前瞻性，精彩的演讲博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本次专题讲座无疑是一场金融知识的盛宴，让重庆渝中区的学员们领略到了金融学大师的风范，受益良多。



### 🌸 CRPE 朱希伟博士赴日开展合作研究

受日本东北大学曾道智教授邀请和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经费资助，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朱希伟博士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10 月 7 日赴日本东北大学开展合作研究。此次合作研究的主题为动态框架内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朱希伟博士与曾道智教授在工资率内生的动态框架内建立一个包含研发部门



与制造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 取得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结论, 圆满完成预定研究任务。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将继续鼓励和支持青年学者与国外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加强学术联系, 开展合作研究, 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 扩大中心的国际知名度。

## ☞ 特色学术活动: CRPE “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 ☞ 第 172 期

报告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

报告题目: Managing Group Interests in China:

State Priorities and Group Power

报告人: 蔡永顺 (香港科技大学)

### ☞ 第 173 期

报告时间: 2012 年 10 月 12 日

报告题目: Vertical Trad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Exchange

Rate Regime

报告人: 唐遥 (Bowdoin College)

# 媒体传播

## 🌸 《国家社科基金：社科理论界“走转改”的助推器》一文引关注

《光明日报》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者王斯敏）为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国家社科基金在促进社科理论界“走转改”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光明日报》于 8 月 29 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对 6 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者和基层一线社科规划管理工作人员的访谈文章。文章刊登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网、中国文明网、求是理论网、搜狐网、光明网等众多知名网站迅速予以转载；很多专家学者看到文章后，对所刊发内容高度认同。

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孙正聿表示，国家社科基金的现实导向，有力地推进了社科理论界的“走转改”。从现实问题中揭示出理论问题，又以理论方式把握和回答现实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为根本的社会责任。正是这种社会责任，要求社科理论界具有不可或缺的三个积累：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

积累。其中,生活积累是活化文献积累和形成思想积累的基础。国家社科基金在促进专家学者形成生活积累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认为,在推动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走转改”方面,国家社科基金起到了“指挥棒”和“助推器”的作用。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设置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能够引导和鼓励专家学者更加深入、更加常态化、更加自发自觉地“走转改”,从而为国家决策提供更加切合实际、有用有益的建议。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指出,国家社科基金为社科理论工作者“走转改”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国家社科基金促进知识分子把研究方向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一旦形成成果,社科理论工作者就可以带着先进的理论成果深入基层为实践服务,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功能。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以自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经历指出,国家社科基金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服务决策方面真正成为了“智囊”。史晋川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温州、台州等地开展了几十次实地调研,产生的成果被温州市委市政府吸纳进金融发展改革创新方案,受到中央高度关注。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感慨,国家社科基金所推动的社科理论界“走转改”意义深远,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发展迅速,不深入持久地“走转改”,就无法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社会,也就无法产出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

转载《光明日报》2012 年 8 月 30 日第 4 版

## ❁ 史晋川：浙江经济这 10 年的创新解码

### ● 开栏语

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回顾浙江这十年来在各项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未来浙江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报从今天起，采用系列访谈的形式，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对浙江十年来各领域的发展脉络，作系统的解读和分析。

过去十年，是中国加入 WTO 的十年，亦是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产业快速升级的十年。

以民营经济和传统制造业为特色的浙江经济更是走在时代前列，这 10 年，国家副主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等浙江经济的掌舵人，对浙江经济的产业升级，都有过明确的阐述。十年的发展，经验自不待言，不足之处更须正视改善。十年经验的总结为的是未来的更好发展，期待浙江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启动新一轮改革，释放新一波制度创新红利，为浙江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重振雄风，觅求新的动能。

访谈嘉宾：史晋川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经济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社科规划办理论经济学科组副组长，杭州、绍兴、嘉兴市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法与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结构理论。

## 十年辉煌：生动实践，战略解码

**青年时报：**十年间，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推动经济强省建设做出了哪些重要部署？

**史晋川：**2001 年中国加入 WTO，自此浙江产品开始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过去十年，浙江大力开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发展出口贸易。2002 年，浙江出口占 GDP 比重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低一些。到了 2008 年，浙江出口占 GDP 的比重已经高达 52%。

但是，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居民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十年来，中国居民的消费由吃穿用转向了住、行。浙江的产业结构也随之需要根据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满足住的需求方面，浙江发展得还不错。但是在其他方面，浙江的产业结构滞后于居民需求结构变化。所以，浙江的产业结构升级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步。许多民营企业看到了国际市场，然后用国际市场的需求替代国内市场，产业结构就无法做出大的调整，这才有了最近几次党代会所提出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

所以，过去十年，从“八八战略”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实践过程中，浙江三届省委省政府在经济领域做的比较重要的部署是围绕着转型升级展开：一是抓住入市契机发展外向型经济；二是“凤凰涅槃”与“腾笼换鸟”战略的提出；三是“四大建设”和四大国家战略举措的实施。

**青年时报：**2006 年两会期间，国家副主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资源禀赋小省浙江应“养好两只鸟”。您认为“凤凰涅槃”与“腾笼换鸟”的提出与实践为浙江经济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史晋川：**浙江的发展一直依赖于传统制造业。而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基本又依赖于低廉的生产要素，即靠投入规模的扩张（规模效应）来发展民营经济，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到了 2005 年左右，这种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浙江要素禀赋的制约，一方面没有充足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也就是说，过去依靠粗放地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并主要通过规模的扩张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已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探索新的经济发展的方式。

所以，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了“凤凰涅槃”与“腾笼换鸟”，目的有两个，一是使传统制造业通过空间的腾挪，到新的空间上进一步扩大规模、促进发展；二是把省内的一些发展空间腾出来，引进新的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一进一出，从两方面来推动浙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转型发展。

过去五六年，浙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这一发展思路。第一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传统制造业通过空间的腾挪和转换，在新的空间有了大发展。但是，浙江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企业的自主创新、产业的转型升级相对来说步伐还有待加快。于是，便有了现在的浙商回归。在浙商回归过程中，可以发现凡是回归的浙商都是当年通过“腾笼换鸟”出去发展，获得了更大规模和更强实力，现在回归浙江来更好地转型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是间接地在实现“腾笼换鸟”的战略目的。

未来浙江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更多地在“换鸟”上动脑筋，如何让腾出来的笼引进新的、更有活力的鸟进来。

**青年时报：**2009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名为“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的“四大建设”。2011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实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舟山群岛新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四大国家战略举措与浙江正在推进的“四大建设”为浙江经济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

**史晋川：**“四大建设”是省委在近两三年提出来的，目前正在实施的过程中，且初见成效。浙江有很多专业化产业聚集区，这些专业化产业聚集区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四大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搭建大平台、发展大产业，同时新上大项目和大企业。比如说，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金华义乌的袜子产业、宁波的服装制造业，这些产业原来规模就很大，现在通过龙头企业（正泰、浪莎、雅戈尔等）的引领，并围绕它们形成了现代产业集群，搭建起专业化产业聚集区向现代产业集群演变、进化的大平台，同时，相关产业也进一步做大做强。另外，这些龙头企业也正在努力做更好的研发、技术创新和营销，做成更好的大企业。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对浙江未来经济发展有很大意义，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战略层面的示范意义。

首先是发展空间的拓展。从陆地发展向海洋发展,这一战略拓展了国家的沿海地区,其中涵括了绝大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对浙江而言,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其次,针对新的发展空间必然要发展新的产业,这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意义非凡。浙江原来的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以满足吃穿用为主,现在的用力点在于满足住行。那么,造船业,特别是远洋巨轮造船业的发展,由单纯满足陆地出行到陆海出行的变迁,体现了发展空间的变化。在新的发展空间里面,要有好的发展,首先要发展这些浙江原来没有的制造业。特别是发展战略性的新型产业,比如海洋能源、海洋生命科学(生物基因工程),在海洋经济当中会占到一个很大的比重。其三,通过发展海洋经济,不仅对区域对国家具有经济上的战略意义,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包括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都有很大作用。最后,利用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不仅会形成新的开放格局,且对体制改革也能找到新的突破。国务院已批准设立舟山保税区,省内学者目前正在研究舟山能否在进一步成为自由港。如果自由港真的成为现实,必将触动体制的巨大变革,体制的大改革会带动整个浙江区域经济和沿海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青年时报:** 在浙江省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分别提出了“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坚持转型升级不动摇”的方针。两个方针对浙江经济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史晋川:** 浙江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一个 1.18 万亿带动“四万亿”的庞大调控计划出台。当时,很多企业搭着宏观经济快速复苏的这个顺风车,又走到了原来的发展老路上去了。也就是说,没有利用金融危机形成倒逼机制力促转型升级。现在,重新强调转型升级不动摇,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处于向上的周期。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处在一个调整期、振荡期。在向上周期时,碰到短期的一时冲击,比如 1997 年东南亚危机,用一些治标的办法,一两年之后,便拨云见日。而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震荡期、波动期的发展时期,短期冲击会比上升周期更加频繁,冲击力度也会更大一些。如果现在不强调坚持转型升级不动摇,光强调利用短期政策稳增长,长期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实际上就是稳

增长，治本实际上就是促转型。坚持转型升级不动摇，实际上是跟未来的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的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大背景有关系的。

### 高速增长的动力：外因与内因

青年时报：2001 年，浙江省 GDP 为 6700 亿元人民币。到了 2011 年，GDP 攀升至 32000 亿元人民币，浙江继广东、江苏、山东之后，成为跨入 GDP“三万亿俱乐部”的第四个省份。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何方？

史晋川：浙江经济去年人均 GDP 是 9086 美元，今年很可能会接近或达到 10000 美元，相对于十年前，区域经济确有长足的发展。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自中国加入 WTO 后，浙江的传统产业结构和国外市场需求比较契合。在对外贸易发展中，浙江制造业的产品能够较好满足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需求。同时，也正是因为中国加入了 WTO，国际贸易随之门槛降低、壁垒减少，浙江产业结构下生产的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使得浙江的传统制造业得到非常大的发展。

其二，十年期间，国际的产业分工格局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步伐加快，尤其是制造环节转移步伐的加快尤为明显。浙江民营企业正是抓住了国际产业格局变化的机遇，充分利用 WTO 游戏规则，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规模扩张与实力提升并行，无形中壮大了浙江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最后，在这十年中。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这三大战略的推进使得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有了一定的变化。十年中，诸多浙江民企利用这一变化趋势，实现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把一部分产业向外转移，从而腾出产业转型的空间。在这方面，娃哈哈即是典型。国内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浙江民营经济在国内重新布局，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大量的发展机遇。

浙江经济十年高速增长，主要的外部驱动力即来自以上三个国内和国际因素。而从内因来看，主要得益于浙江历史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及制度创新红利，



即浙江经济的民营化程度高,浙江的民企抓住了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机遇,壮大了自身,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 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改革:压力与机遇

青年时报:过去十年,浙江正是得益于加入 WTO 的契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也就此造成了浙江外贸依存度过高的产业问题。目前,世界经济复苏难言顺遂,欧债危机日趋恶化,浙江的出口增长势必将面临长期压力。另一方面,“浙江制造”仍未突破身处国际贸易体系中中低端的无奈现状,同时还面临着中西部地区和印度、越南等国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威胁;而且节能减排的压力也很大。如何评价过去十年浙江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得与失?

史晋川:过去十年,尽管浙江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区域发展也比较快,但是回头来看,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到浙江的下一步发展动力及未来可持续发展。

其一,浙江企业的自主创新提升较慢。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走向国际市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浙江制造业迅速壮大,但另一方面浙江民企大多数只注重制造业的制造环节,对于价值链更高端的另两个环节——处于制造业前端的研发和设计与处于制造业后端的品牌营销,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浙江民企习惯于贴牌加工,企业出口的产品用的是外商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销售渠道,浙江企业大多依靠廉价要素的低成本来维系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因此,较难经受国际经济的外部冲击。

其二,浙江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缓慢。由于浙江的传统制造业面对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的吸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了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浙江却相对忽视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工业化阶段的变化,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发展缓慢。在近十年中,与广东、江苏相比,浙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企业规模、资金投入等各方面都已落后。

其三,浙江的改革先发优势开始弱化。由于内外部条件的制约,浙江的改革制度创新不足,企业的改革缺乏亮点,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呈弱化趋势。

这三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浙江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后续发展动力不足。

**青年时报:**如何给民资一个出口是浙江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又一难题。为此,今年国务院决定设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那么,民间资金如何突破技术、人才、市场和体制等方面的壁垒,从而有效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

**史晋川:**过去十年,浙江的金融体制包括整个要素市场体制,未得到深化与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浙江的金融体制还是跟全国差不多性质,金融机构以国有银行、大银行大金融机构为主。而浙江的实体经济,是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结果,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在所有制与规模方面,面临着双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就制约了浙江企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浙江的间接融资的渠道相对发达,而直接融资却非常落后,包括发行企业债、PE、VC等,都有不足。所以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的支持。金融体制改革,虽然从全国来看都比较慢,但浙江民企发展较快,所以金融体制在浙江就显得尤其不适应和滞后,严重制约了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

目前的金融体制,动员民间资金和配置金融资源两方面的效率都相对较低,一方面大量的民间资金动员不到金融体系中,另外一方面动员进来的资金在配置过程中效率低下。在当下的中国,银行的效益高,不等于金融体系的效率高。

温州要做好金融改革,决不能为金融改革而改革,为金融创新而创新,关键是要把金融的改革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落脚点是要把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只有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深入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如果一味在金融领域里折腾,金融体制的改革创新的前景堪忧。金融系统就好比自来水网管,实体经济就是锅碗瓢勺,自来水网管修好了,水龙头一拧,水哗哗地出来了,但是接水的这些锅碗瓢勺容器这个漏那个破,这样的金融改革还是不会成功。

### 期待浙商群体 从懂市场到懂技术

青年时报：无论是“浙江制造”的转型升级，还是金融综合改革，都少不了浙江民营企业主（浙商）的参与。而浙商是过去十年中国最为知名的区域性商人团体之一，如何评价这个群体？新形势下，浙江民企遭遇了怎样的挑战？

史晋川：回望浙商的发展历程，浙商有条不紊地从行商到坐商，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这期间浙商展现的最大优势就是——懂市场。浙商从浙江区内的市场做到“三北市场”（东北、西北、华北），再做到全国市场，乃至做到国际市场，其最大特征即是懂市场。浙商抓住了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市场需求，做出灵敏的反应，从而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浙商对整个产业的供应面因素的了解相对较弱，比如产品研发、工艺革新，技术创新等。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可以靠企业家的直觉，但是供应面的问题（技术、工艺的研发）大多不能靠直觉，需要的是企业家的知识储备等各方面的素质提升。毋庸讳言，身处传统制造业的浙商，在这方面有着先天的缺陷。即使像以马云为代表的新一代浙商也有这个问题，懂市场多，懂技术少。技术不仅只是用来满足市场需求的，技术还可以用来开发出新的市场需求和引领市场需求发展趋势。今后浙商的自主创新、转型升级，必须突破自身的瓶颈，既懂市场，又懂技术，更懂管理。特别是在浙商国际化的过程中要更多地掌握和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通行规则。

国家的产业准入政策，目前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依旧制约严重。在实体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的投资依然遭遇玻璃天花板。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民营资本实际还是投不进去，在金融、保险等领域，准入事实上仍过于严格。尽管国务院出台了“三十六条”和“新三十六条”，但是从大制度环境上来讲，由于国有垄断部门的存在，在由国有企业占据垄断地位的那些行业，民营企业事实上是进不去的。这就阻碍了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这个问题不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国家有关部门的问题。

### 未来十年转型发展三个关键词

青年时报：十年已然过去，今天的经验总结是为了给未来十年更明确的发展方向。您对未来十年浙江经济的发展有何期许？

史晋川：对浙江来说，未来十年的关键在于，根据科学发展观，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发展。转型发展在我看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发展；第二，解决统筹城乡发展，改善民生和增进民主为核心的社会转型发展；第三，克服经济转型发展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为核心的体制转型。

三大转型中，体制转型最关键。体制转型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去十年，浙江经济有三大滞后，刚才提到了浙江产业结构转型的滞后、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现在要说的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其职能转变的滞后。去年浙商大会，夏宝龙省长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扪心自问“四个够不够”，谈的正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如果说浙江在未来发展中，能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那么，就可以克服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制度性的障碍，更好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谱写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篇章。

具体内容详见《青年时报》2012 年 10 月 16 日第 A02 版